

■政治学理论

政治冲突与西方政体设计

陈明凡¹, 宋衍涛²

(1.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 2. 哈尔滨师范大学 政教系,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作者简介] 陈明凡(1972-),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讲师, 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 宋衍涛(1969-), 男, 黑龙江哈尔滨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讲师,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摘 要] 政治冲突机制能够保持权力的平衡, 冲突有助于统一体的建立。政治冲突, 而不是崩溃或分裂, 是一种平衡, 因而也是维持作为运转中的政治体系的手段。政治冲突对于政体设计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 政治冲突; 民主冲突; 冲突制衡; 安全阀机制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28(2003)04 \ | 0493-05

政治冲突是政治主体之间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是矛盾各方为谋求政治利益、政治权力或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围绕着公共政治权力所发生的摩擦、对抗和争斗的方式与过程, 也可以“把涉及国家政府的冲突称为政治冲突”^[1](第 58 页)。所谓政治主体, 是指进入政治过程, 围绕政治目标并发生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 包括立法机关、议会党团、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党组织、利益集团和政治过程中的公民、阶级、种族。政治冲突的表现形式有“政治分歧、政治不合作、政治对立、政治竞争”。政治冲突的类型有“政治机构冲突、政治领导集团内部冲突、政党冲突、利益集团冲突、公民冲突、政治权力冲突、政治参与冲突、政治发展冲突”。

所谓政体设计, 是指政治主体依据一定的原则和目标, 将政治体系各要素的活动进行科学的建构, 并有效运转, 把政治任务、政治责任、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进行有效组合和协调的活动。政治“冲突建立并保持权力的平衡”^[2](第 119 页), “冲突有助于统一体的建立”^[2](第 135 页)。“冲突, 而不是崩溃或分裂, 确实是一种平衡”^[2](第 123 页), 因而也是维持作为运转中的政治体系的手段。“作为一个平衡机制而服务于社会, 有助于社会的维持和巩固”^[2](第 123 页)。“民主意味着接受冲突, 并非是为了平息冲突, 而是为了避免让它们以暴力的形式来表现。”“民主的阶级斗争: 在任何现代民主政治里……并非变得日益诉诸暴力和日益具有破坏性, 而是通过各种组织和机构得到抑制, 通过组织和机构, 冲突可以在宪法制度之内得到表现。政治党派、选举和议会, 使得冲突成为可能, 又不至于爆发革命”^[3 \](第 141 页)。因此, 政治冲突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政体设计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一、政治冲突与有限民主政体设计

防止政治冲突瓦解双方的关系基础的防护器就存在于政治结构自身之中: 它是由政治冲突的制度

化和承受力提供的。政治冲突是成为政治关系的平衡手段或对立要求的再调整手段,还是成为分裂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赖以发生的政治结构,政治结构在允许表达对抗的要求方面是不同的。君主制有一种压制冲突的倾向,所以政治冲突爆发在这样一个经常压抑敌意情感表达的政治结构之中,它就显得特别强烈。这种冲突的目标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先前所积累的所有愤怒和被压抑的情感易于在此时一同发泄出来,并且冲突越是被压制的地方,冲突一旦爆发,就可能危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基础。民主政治结构则显得比其他政治结构更能承受冲突^[2](第 136 页)。雅典的有限民主制的形成过程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公元前 594 年,雅典社会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阶级冲突和党派冲突。贵族掌握并极力维护着寡头政体的政治权力;平民则要求推翻它建立利益共享的民主政体;工商业者则反对前两者的观点,主张建立中庸的有限民主制。梭伦依据政治冲突各方的利益均衡原则对当时的政体进行了新的设计,也就是“手持坚盾我挺身遮护两者,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取胜”^[4](第 12 页),在“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设置一个适中的权利界限”,调整导致政治冲突的社会政治结构,重新分配社会政治权利和义务,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新的政治结构。他所建立的“有限的、温和的、自由民主制”使冲突各方的势力得到了平衡。尽管这种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会很快被新的政治冲突所打破。

梭伦建立的这种政体之所以被称做“有限的民主制”,是因为当时的民主权利和义务只是贵族和富有的平民享有,而奴隶和外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因此,这种制度是有局限性的,也限制了民主冲突的范围。但梭伦的贡献就在于他所设计的有限民主制蕴涵了政治冲突的制度设计。政治冲突各方因自身的优势而产生的权力在社会政治结构中都能够得以体现。公民可以选举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具有任期,这可以避免由于任期过长将冲突激化,同时赋予富人担任高级公职的特权。元老院的权力受到了削弱,公民大会的地位得到提升,设立了“四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公民均可当选为陪审员的陪审法庭的设立打破了贵族对立法、司法、行政的垄断。陪审法庭在实际上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与元老院、执政官和公民大会分庭抗礼。这种相互冲突的制度设计可以使贵族和平民的政治利益获得某种均衡。梭伦说“我给了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利,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即使那些既有势力又富豪的人,我也设法不使他们受到损害”^[5](第 185 页)。在这里,政治冲突“使对抗者结合”^[2](第 106 页)。梭伦还通过法律把自由民主制度系统化、规范化,将民主政治的冲突机制制度化。在这里,政治冲突“扮演了一个激发器的角色,它激发了新规范、规则和制度的建立”^[2](第 114 页)。

公元前 441 年伯里克利当政期间,他将民主政体的冲突制衡机制进一步具体化、可操作化。雅典公民不分等级均可以当选为国家执政官和其他行政官职,但不得连任。公民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约每十天召开一次,凡年满 18 岁的男性公民均有权参加、商讨和解决国家的一切大事,并有权在会上提出建议或批评公职人员。而且,任何公民都可提出议案,并参加讨论表决,通常是先由 500 人议会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然后进行讨论,如无异议,议案就被认为按照 500 人议会的意见通过了。公民大会通过的议案还得送交陪审法院进行审查,陪审法院中设有特别委员会专门进行这一工作,经陪审法院认可的议案,才能正式成为法律,三者相互制约。

梭伦之后,雅典虽然也出现了僭主政体、贵族政体、平民政体等统治形式,但它们也都是以整合政治冲突为出发点的。僭主制消灭或抑制了政治冲突;贵族政体是小范围“精英”的政治冲突;平民政体则扩大了政治冲突。由于民主制是有限度的、温和的政治冲突,它符合政治主体以及政治生活的需要,因此尽管多次被推翻,但由于民主制已在人们心中植根,所以总是成为政治主体进行政体设计的第一选择。

二、政治冲突与混合政体设计

柏拉图根据政治冲突的烈度、人数的多少、涉及的范围、合法性与否将政体分为王制和僭主制;贵族制(贤人政治)和寡头制;共和制(民主政治)和平民制。柏拉图认为政治冲突导致政体形式变迁的路线

是:贤人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僭主政体。其中,政治冲突最剧烈的是平民政体,另一个极端是消灭和压制了政治冲突的僭主政体。这两种政体运行缺乏法治的保障或虽有法律但无人遵守。平民政体剧烈的政治冲突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影响到政体的稳定性。僭主政体的专制统治使必要的民主冲突都被消灭殆尽,使政治体系的运转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在他看来,贤人政治是理想政体,在城邦治理中,相对于哲学家的智慧和知识,法律仅居于次要位置。柏拉图虽然认为法治不如哲学家执政,但从实际考虑,还是承认了在没有哲学王的条件下,良好政治体系设计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城邦受法律的支配,而不应受个别统治者和特殊阶级或利益集团的支配。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力,无论对行使权力者还是服从权力者都是灾难性的。为此,柏拉图接受了有限的民主原则,并设计了一种冲突制衡的混合政体。这种混合政体接近于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的混合,吸收了寡头政体抑制或消灭政治冲突的优势和平民政体民主冲突机制设计,在几个方面划分权力,将平民成分与某种权威相结合。

波利比阿认为任何单一的统治形式都会以特定的方式爆发政治冲突,因为每种这样的政体只能体现单一或简单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就其本性来说存在产生政治冲突的因素,并有蜕变为自己的对立物的可能性。因此,君主制蜕变为暴君制,贵族制蜕变为寡头制,民主制蜕变为暴民政体。而三种蜕变的政体又会被社会冲突所推翻,被新政体取代。但他认为这个怪圈对于罗马帝国并不适应,罗马人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和优点相混合,使这三种要素都得到准确的调整并处于适当的平衡状态,从而避免了单一政体设计的自发的政治冲突趋向,保证国家的稳定^[6](第55页)。

如果人们只注意执政官的权力,那罗马国家就完全是君主制。君主制的特点有助于整合政治冲突;如果人们只注意元老院的权力,它又完全是贵族制,贵族制是小范围“精英”的民主冲突,有助于理性地整合政治问题,但缺乏民众的参与,容易忽视民众的利益,引起民众的不满;而如果只注意民众的权力,它显然又是民主制,民主制扩大了民主冲突的范围,广泛地吸收民众参与,但容易导致混乱、政治不稳定。三种统治形式扬长避短综合到一起有利于发挥优势。混合政体充分体现出了民主冲突制度设计,三种权力即相互钳制,又相互支持与合作,实现了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平衡,防止任一权力无限扩张或过于强大。这样就可以使执政官不至于形成专横或因而引起暴乱,使元老院不会强大到引起公众的不满,使平民会议不会无所控制到无视政府。每个部分钳制其他部分,又与之合作,在所有紧急情况下,它们的联合又是非常适当的。它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于一身,又不使其中任何一个原则过分地膨胀,从而蜕变为自己的对立面。每一种力量都被其他两个所抵消,任何一个都不能压倒和超过其他力量。因此,这个政体能够保持长时间的均衡状态。

混合政体中的民主政治可能会经历大量的政治冲突,但它自身易于构成抑制那种破坏统一的机制:社会成员的力量被分散在许多方向的冲突上,因此不会集中在一种冲突上而使政治结构分裂。

三、政治冲突与分权政体设计

在富有弹性的政治结构里,大量的政治冲突相互交叉进行,因此阻止了沿一个轴心发生的根本性分裂,政治冲突构成了一个政治体系的平衡机制。在松散结构的民主政体和开放的社会里,冲突的目标在于消解对抗者之间的紧张,它可以具有稳定和整合的功能。由于允许对抗的要求直接和立刻表达出来,这样的政治体系能够通过消除不满的原因重新调整它们的政治结构。它们所经历的多种多样的冲突,将有助于消除引起分裂的根源并重建统一。通过对冲突的宽容和制度化,这些政治体系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稳定机制^[2](第137页)。分权政体的设计就体现了这种冲突制衡机制。

洛克认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极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是”^[7](第89页)。因此,对政治权力必须进行冲突性设计。作为这种冲突机制的体现,洛克认为立法权和执行权应

该分立,并由不同的人掌握不同权力。英国的政体设计就是遵循了相互冲突制衡这一精神。国会拥有立法权,并有权对政府行政进行监督,上下两院各司其职,彼此制约。行政权由内阁掌握,但需向国会负责,接受国会的监督。司法权由法院掌握,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未经证实有失职行为得终身任职。之所以保留君主,是因为君主制能够抑制政治冲突、防止民主政体由于冲突过激而导致政治结构分裂解体,从而维护国家统一。另外,国家机构内部冲突“也能在结构中充当查明对抗双方相对实力的工具,由此成为维护或不断重新调整权力平衡的机制”^[2](第 137 页)。既然冲突的爆发表明在双方之间先前存在的通融被否定,一旦对抗者各自的权力通过冲突被确定下来,一个新的平衡就会建立,相互关系也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8](第 154 页)。为此,他提出通过政治机构相互冲突机制的设计理念来保障政府的权力运行,即“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8](第 157 页),“运用相互对抗的野心或者相互冲突的利益,通过把个人的利益与其立宪权利相适应来实现”^[9](第 78 页),形成一种能联合各种政治力量,又能使他们彼此调节配合并相互制约的制度。因此,他认为国家权力应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相互冲突制衡。

杰弗逊认为政治体系中权力的自我膨胀是产生暴政、毁灭人权、爆发高烈度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实行分权制衡设计,即要限制过度的政治冲突,又要保证必要的民主冲突。根据美国的实际,他认为行政权最易产生暴政,因为宪法赋予总统以极大权力,并允许连选连任,这极易导致总统独裁,各利益集团冲突激化。因此,他主张要限制总统任期,以两届为限,轮番执政,这样可以缓和政治冲突。此外,杰弗逊还认为司法权也是易于产生专权的危险部门。他看到联邦党人控制下的最高法院以判例形式轻取违宪审查权,并以此干涉国会、总统权限,而法院扩张权力极易导致寡头统治,所以应加以限制。为此,他在任内采用“弹劾”办法,向扩张的司法权施加压力,从而维持了分权制衡格局。对于立法权,他认为虽由多数人行使,但若不受限制也会产生暴政。他提出“173 个暴君(指议会)肯定会和一个暴君一样,富于压迫性”^[10](第 229 页)。

汉密尔顿认为,“所有权力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一些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者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9](第 81 页)。在一个对冲突根本没有或有但不够充分的容忍和制度化的政治结构里,冲突易于导致机能失调。冲突导致的分裂的威胁的强度和对政治体系的公认基础的破坏程度,与这个政治结构的僵化程度有关。威胁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内部平衡的不是这样的冲突,而是僵化本身。这种僵化使得敌意能够积累起来,一旦冲突爆发,这种积累的敌意就会集中到一条导致分裂的主线上。而克服这一点的根本途径是“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设计模式。为了保持三权的相对分立,就要使各权力部门互不依赖,并赋予各部门以必要的抵制任何其他部门的侵犯行为的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但是,这种防御手段必须与侵犯的程度相适应。

综上所述,冲突在政治体系中经常发生有助于现存的规范获得新生;或者推动新规范的产生。在这种意义上说,政治冲突是一个调整规范适合新环境的机制。一个弹性的政治体系从冲突中受益,因为这种行为通过创新和改进规范保证了它在新条件下继续存在。这种重新调整规范的机制在一个僵化的政治体系里几乎是得不到的:后者由于压制冲突,从而也消除了一个有用的警报,因此把灾难性崩溃的危险增大到极限^[2](第 137 页)。

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允许对抗的要求自由表达,政治体系对冲突的容忍或制度化有不同的程度。没有一个政治体系能允许每一种敌对的要求或主张都立刻表达出来。当对抗所出自的政治关系仍保持完整无损时,政治体系提供了一种引导不满和敌意的机制。这种机制通过“安全阀”制度经常地发生作用。这种制度提供转移敌对感情的替代物,同样也是发泄侵略性倾向的替代物。安全阀制度可以用来维护政治结构和政治主体的安全系统,但对二者又不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阻碍了政治关系的变更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因此它们能提供给政治主体的满足程度只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因此,人们提出

了一假说,认为那种僵化的政治结构即不允许对抗的主张直接表达的政治结构需要这种安全阀制度^[2](第138页)。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发泄积累的敌对情绪,另一方面,可以使统治者得到“政治信息”,体察民情,避免灾难性政治冲突的爆发。刚性政治体系与当代极权主义社会一样可以通过类似一成不变地反犹太人或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等安全阀制度成功地把敌对感情引向某一方面。然而,由于他们缺乏改变条件的调适手段,使得冲突的机会和敌意积累起来,最终将直接威胁意见的一致。相反,灵活的政治体系由于允许冲突发生而使得破坏意见一致的危险变少,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平衡机制。

[参 考 文 献]

- [1] [美] 罗伯特·A·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M].尤正明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 [2] [美] 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3] [英] 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M].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4]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0卷[M].颜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5] [古希腊]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M].陆永庭,吴彭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6]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
- [7] [英] 洛克.政府论:下[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8]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9] [美]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M].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 [10] [美] 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M].朱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责任编辑 叶娟丽)

Political Conflict & Western Regime Design

CHEN Ming-fan¹, SONG Yan-tao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 Economic Management,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Heilongjiang, China)

Biographies: CHEN Ming-fan (1972-),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olitics; SONG Yan-tao (1969-), male, Lecturer,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 Economic Management,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olitical theory.

Abstract: The mechanism of political conflict can keep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conflict is helpfu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y. The political conflict, is really a kind of balance, other than disintegration or disruption, so it is also a means to maintain the political system that is revolving. As a balance mechanism to service the society, it's helpful to maintain and consolidate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e political conflict can play a decisive role on the regime design. This thesis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from the angle of th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regime design of limited democracy, the mixed regime design, the regime design of division of power.

Key words: political conflict; democracy conflict; conditions of conflict; mechanism of safety value